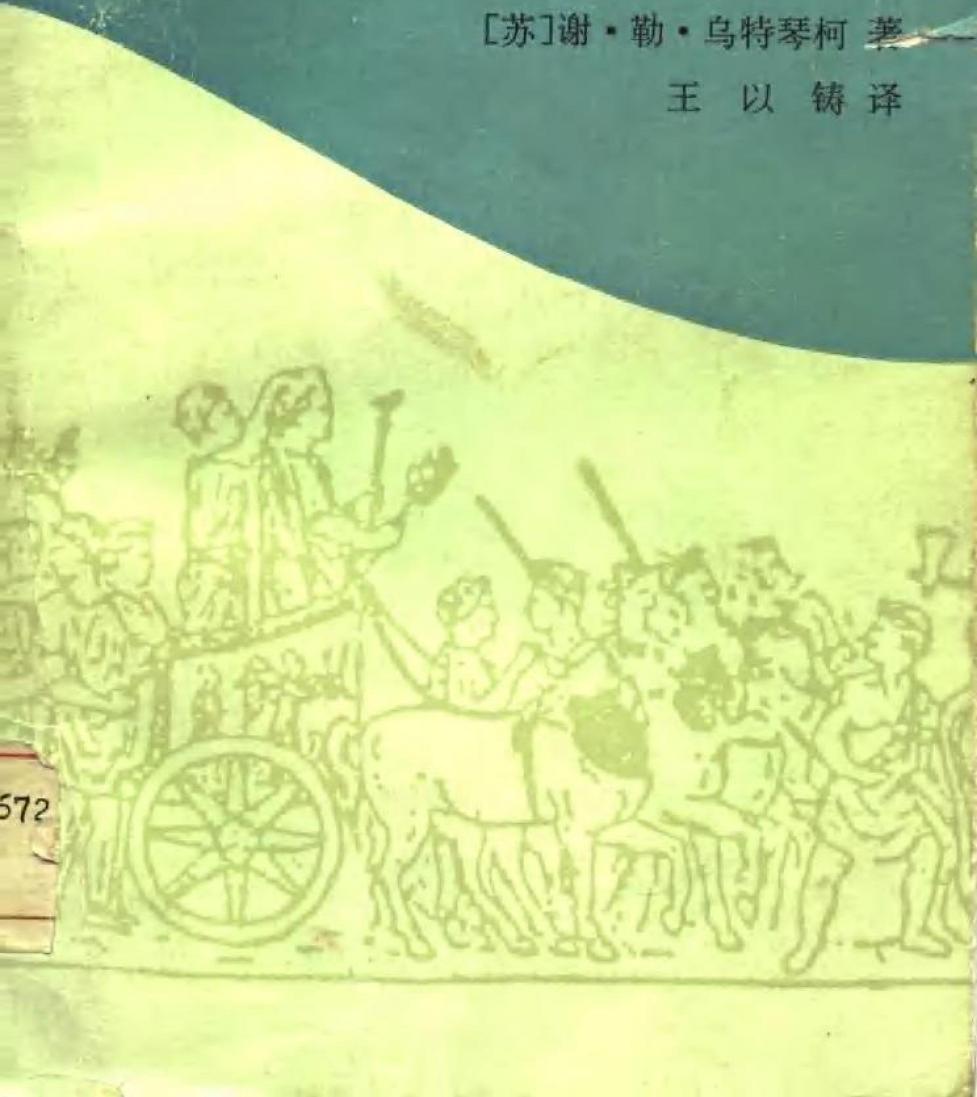


恺撒评传

[苏]谢·勒·乌特琴柯 著

王以铸译



责任编辑 曾梅筠 徐葆初
责任校对 张平贵
封面设计 尹凤阁
版式设计 李玲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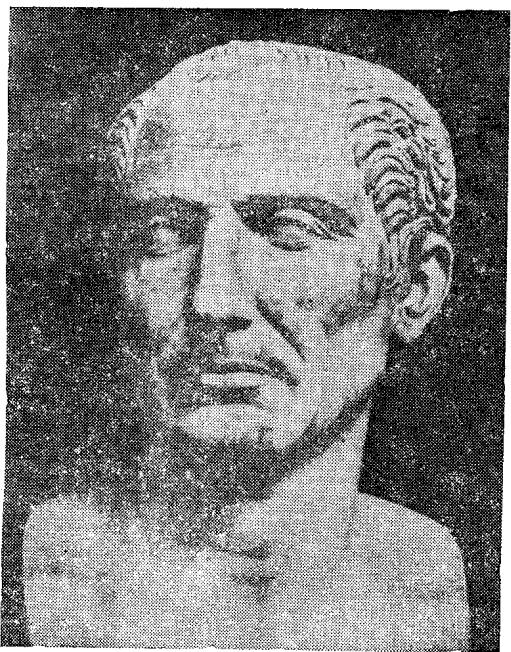
恺撒评传
KAISA PINGZHUA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6印张 3插页 355千字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 册
统一书号：11190·179 定价：2.80元

С. Л. Утченко
ЮЛИЙ ЦЕЗАРЬ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ысль» Москва
(根据苏联思想出版社 1976 年版翻译)



恺 撒 像

目 录

译者序——补充说明几个问题…………… 1

 关于恺撒的个人作用问题——关于恺撒的仁慈

 政策——恺撒和庞培——西塞罗和恺撒——罗

 马的婚姻与妇女问题

第一章 世界史学中恺撒的形象。

 有关恺撒的神话…………… 1

第二章 盖乌斯·优利乌斯·恺撒：

 出身、青年时代、从政的开始…………… 49

第三章 三头。出任执政官…………… 95

第四章 高卢战争。任同执政官长官…………… 147

第五章 伟大的高卢起义。鲁比康的前夜…………… 203

第六章 内战…………… 273

第七章 恺撒的独裁…………… 356

第八章 3月15日事件。总结和结论…………… 408

附录： 恺撒生平年表…………… 445

第一章

世界史学中恺撒的形象。 有关恺撒的神话

盖乌斯·优利乌斯·恺撒是历史上罕见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的形象并不因年深日久而磨灭其光彩，他的声誉也经得起时代的考验。他是一位具有多方面天才的杰出统帅和同样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对于这一点，世世代代的人们看来是没有任何争论的。恺撒就是带着这样一些头衔，这样一些出色的评语出现在历史之中的。但实际情况是否如此？人们是否始终这样认为？第一个问题要用一整本书来回答；对于第二个问题，则我试图在这一章里给以回答。

恺撒的同时代人和离开他很近的后人们如何评价他？在着手综述这些人的意见和述评之前，我们认为，不妨先弄清楚——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些评价本身的价值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们可信到什么程度的问题。首先，对于某个人物的历史意义的客观评价，较之对于某一事件的估价，总是更加复杂和更加难以掌握和处理的。其次，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对于恺撒的同时代人和离开他很近的后人们所提供的证据，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要采取十分审慎的态度 (*cum grano salis*)。

同时代人所提供的证据毫无疑问是十分珍贵的，因为这

些资料来自直接的感受，保存了有关这样一些细节的知识和对于这样一些不同色调的感觉，而这些东西在不是直接参加或亲眼看到那些事件的人们的记载中几乎总是看不到的。最后，任何人也不能象同时代人那样程度地把环境的最有代表性的特点、“时代的气氛”把握住并表达出来。同时，任何人也不是如此经常地受环境的影响和个人偏爱的制约，因此也就不能对任何一个历史人物的意义从总的方面加以公正无私的估价，更何况任何一个同时代人都没有在回顾本身中所包含的那些客观的优点。

从另一方面来说，后人、后来世世代代的代表者却总是并且名副其实地是受回顾的影响的。他们并不能摆脱这种影响，他们的一切感受都受这种影响的制约，因而他们犯这样一些错误：作目的论的评价，作出似是而非的结论，陷入危险的历史偏差。许多历史活动家的命运和身后的声誉——顺便说一下，后面还要谈到其中的某些人——可以作为这种情况的最好的例证。

话虽如此，这类文献还是十分重要的。就我们的情况而论，如果考虑到同时代人的话，那末，显然应当从恺撒的“自我评价”开始，而这些评价就保存在他自己的回忆录里。在所谓《恺撒著作集》(Corpus Caesarianum)中，有一些作品保存到今天，它们是：《高卢战记》^①、《内战记》^②，还有《亚力山大战记》^③、《亚非利加战记》^④，最后则是《西班牙战记》^⑤。虽然这些作品被收入了《恺撒著作集》

① 《De Bello Gallico》——译注

② 《De Bello Civili》——译注

③ 《Bellum Alexandrinum》——译注

④ 《Bellum Africum》——译注

⑤ 《Bellum Hispaniense》——译注

并且通常冠以恺撒的名字，但它们却远非出自恺撒一人之手。前两部作品毫无疑问是恺撒撰述的（但《高卢战记》的最后一卷、即第八卷则是恺撒手下的一位著名的将领奥路斯·希尔提乌斯^①写的），而其余的作品则出自他的战友和部下之手。关于《亚力山大战记》和《阿非利加战记》的作者，早在古代人们便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说法和猜测（人们举出了恺撒的一位知心朋友欧皮乌斯以及同是那个希尔提乌斯的名字^②）。有关《西班牙战记》的作者，则人们甚至连一个假想的作者也提不出来。关于此书，我们只能指出，保存下来的本子残缺得很厉害，它大概是恺撒部队中的一位下级军官，甚至可能根本不是军人写的^③（不过作者肯定是事件的参加者）。

当作史料来看，恺撒的《战记》（和《著作集》中其余作品）的意义，下面我们还要谈到^④。现在我们注意的只是这样的问题：通过恺撒的回忆录，我们看到的他的形象是怎样的；在有关高卢战争和内战的札记中，他本人突出了本身的人格和性格方面的哪些特点。人们早就注意到，具有鲜明倾向性的回忆录（当然，特别是《内战记》）写得十分巧妙，能够给人以十分可信的印象。恺撒（就象色诺芬在《万人远征记》^⑤里那样）始终只是用第三人称来谈到自己的，

① 希尔提乌斯自公元前54年起在恺撒麾下服役，内战期间他在西班牙和东方服役。恺撒死后第二年，即公元前43年他任执政官，同年他参加屋大维（奥古斯都）解木提纳之围，在此役中战死。——译注

② 《圣优利乌斯传》（即《恺撒传》），第56章。

③ 按此书记述水平低，文字也不甚通顺，故而人们有此推测。——译注

④ 见本书原文第114—116页。

⑤ 色诺芬（约公元前430—约公元前355）古希腊历史学家、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他的《万人远征记》一书记述他在前401年随波斯国王小居鲁士（大流士二世的儿子）进行反对阿尔塔克谢尔克谢斯二世的远征的事情。这次出征失败后，作者曾在一万名希腊雇佣军的撤退中起领导作用。——译注

这一点再次强调了他的叙述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在恺撒的“自我描述”中，我们看到怎样的一些基本特点呢？在《高卢战记》中，作者对自己的军事才能作了重点的叙述：他行动迅速，富于机动性，有很大的预见性并且善于预测敌人的意图。作者完全以行家的身份记述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战斗。我们看到的作者决不仅仅是一位军事方面的业余爱好者，而是一位精通军事的专家，一位富有经验的天才统帅。

部分地在恺撒的第一部著作里，而主要是在《内战记》里，作者还突出了“自我描述”的其他特点：对敌人温和、仁慈；深受士兵的爱戴；战士们对自己的统帅极为忠诚。而且，作者对这一切又没有任何着意渲染之处，有时仿佛只是顺便提到，因而给人以完全合于客观实际的印象。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在两部作品里恺撒的名字以这种不显眼的方式竟然提到七百七十五次之多，那末这种“客观”与“谦逊”也就如同他始终以第三人称提到自己的做法一样，有稍稍不同的色调了！①

总之，我们可以认为，收入《恺撒著作集》的无论恺撒本人的还是其他作家的作品，都是在古典文献的历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一种特殊体裁的典范。而且，这种战争回忆录的体裁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在这类著作里，文献资料的利用是同“军事小说”的要素别致地结合在一起的。

西塞罗的保存到今天的大量作品对于评价恺撒其人是十分重要和引人注意的。西塞罗不仅是恺撒的同时代人，而且他的命运和政治生涯同恺撒有密切的联系，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于恺撒，这种在程度上时而不同的密切联系在恺撒的一

① 巴尔斯顿(J. P. V. D. Balsdon)：《优利乌斯·恺撒：政治传记》(Julius Caesar, A Political Biography)，1967年纽约版，第104—105页。

生当中是不曾中断的。因此，关于罗马历史上这两位如此重要而又如此不同的活动家之间关系的问题，人们写下了大量的作品：有关恺撒的作品没有、也不可能有一部能不谈他同西塞罗的关系的问题，就如同在涉及西塞罗的生平和事业的著作里，不可避免地要有恺撒出现一样。此外，还有一系列的研究作品是专门探讨他们之间关系的历史的。这样的著作可以举出威尔里希 (H. Willrich) 的《西塞罗和恺撒。在元老院的统治和神圣王国之间》(Cicero und Caesar. Zwischen Senatsherrschaft und Gottkönigtum)(1944年，戈丁根版)；洛斯曼 (F. Lossman) 的《公元前54年的西塞罗与恺撒》(Cicero und Caesar im Jahre 54)(1962年，威斯巴登版)和盖尔策尔 (M. Gelzer) 的《西塞罗和恺撒》(Cicero und Caesar)(1968年，威斯巴登版)。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也不应该详细论述这个问题。但是有一切理由来谈论恺撒对伟大演说家的极为“容忍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爱护的”态度。内战爆发时，恺撒试图把他拉到自己一方面来，要求他给予建议和支持，而且甚至在西塞罗公然投向庞培的一边并且到庞培的营地去之后，恺撒都没有把他算到敌人中间去，而在恺撒以胜利者的身分返回祖国后，还对他表示明显的善意态度。而最后，当西塞罗在内战的最后一次战役期间为恺撒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加图发表颂词的时候，权力极大的独裁官不仅赶忙对此作出回答，他甚至好象表示歉意似的，说西塞罗不要把他的“军人的话”同杰出的演说家的优美的语言相比^①。

① 普鲁塔克：《恺撒传》，第3章，再参见普鲁塔克：《西塞罗传》，第39章。译者按：公元一世纪罗马统治时期的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的作品有很多演义的成分，不能作真正的史料来看待。

恺撒对西塞罗的态度大致就是如此。但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感到兴趣的无宁是相反的问题：他同时代的最杰出人物之一是如何看恺撒的，是如何评价他的事业的？不过对于涉及这一估价的问题，人们的回答却未必是一致的。问题在于，在我们考察了西塞罗的传世作品之后，至少可以发现⁷三种不同的评价，三种不同的恺撒形象，它们就在不怎么长的时间当中依次出现。

使西塞罗重新审查自己观点的决定性关头，就是公元前44年3月15日恺撒在元老院被刺的事件。然而改变的与其说是评价的意义或内容，不如说是它们的程度。但这却带来了在质量上是新的某种要素。不过，即使在那一决定性关头以前，也就是当恺撒在世的时候，评价在性质上也并不是一致的。一切都要看这些评价出现在西塞罗的著作的哪一部分里面。有一部分可以说是非正式的，例如西塞罗同友人的通信；有一部分，如演说和论文，则是正式的。在这两部分当中存在着不同的说法、评价、描述。这一事实是未必需要特别加以解释的。

在西塞罗的传世的大量书信当中（他在书信中可以直截了当、无所保留地表述自己的看法），他把恺撒主要看成是一个政治上的阴谋家和冒险家，看成是一个极力想推翻现存的国体和攫取独裁大权的人物。不过西塞罗在书信中最初提到恺撒时，他的态度却是相当中立的：只有在谈到克洛狄乌斯的丑闻^①时，恺撒的名字才出现。但是当人们刚刚看清楚

① 参见本书原文第86—87页。译者按：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普尔凯尔(Publius Clodius Pulcher)生于公元前92年左右。他同恺撒的妻子有私。在公元前62年12月一年一度的、为“善良女神”(Bona Dea)举行的节日里，他化妆为女人混入恺撒家中并当场被捉住。前61年对克洛狄乌斯进行审讯时，西塞罗认为他是有罪的，但克洛狄乌斯因行贿而得到赦免。

三头(Triumviri)^①的轮廓时(且不说恺撒任执政官一事),西塞罗对恺撒的态度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诚然,在起初只是很不明显的暗示和间接表示不赞成的意见,但后来他越来越频繁地和公开地把三头称为“统治者”、“不公正的统治者”,而这之后他甚至谈起“王权”与“横傲的国王”来了。当然,这些抨击和指责更多带有“集体的”性质,而西塞罗本人在被流放之前,却不得不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而甚至向三头,首先是向庞培寻求支持了。

西塞罗从流放地回来之后,就开始了他同三头接近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里,他加强了同恺撒之间的“友谊”。他曾多次雄辩地谈论过这一“友谊”。就是在西塞罗给他的兄弟克温图斯的信里,也有不少地方谈到从双方表现出来的这种友谊。顺便说一下,克温图斯这时正在恺撒的参谋部中并且无论在高卢还是在不列塔尼亚都曾积极地参加了恺撒的军事活动。在这些信里,恺撒被称为“最出色的和慷慨大度的人”或“最优秀的和有强大力量的人”,而在给克温图斯的一封信里,西塞罗竟公然宣称:“除了你和我们的孩子之外,他就是我最关心的人了——对他关心到几乎和对你一样的程度。”^②当然,写出这一切是因为他考虑到,这些话是会给恺撒本人看到的。

但是,一旦有了爆发内战的危险,西塞罗的态度就再次奇妙地发生了变化。诚然,西塞罗是主张调解的,他认为应该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来避免战争,但他本人则明显地站在庞

① 指恺撒、克拉苏斯和庞培三人之间的联盟。这一联盟是私人性质的,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译注

② 《致克温图斯书》,第3卷,第1章,第18节;《致友人书》,第7卷,第5章,第1节。译者按:克温图斯是比西塞罗小四岁的弟弟,西塞罗给他的信是在公元前60年到前54年间写的。

培的一边，也就是说，理所当然地站在元老院的一边。因此，这时在他的通信中再次占上风的，就是他对恺撒的比较真实的并且一直不是善意的态度了。

当内战爆发后而庞培对此毫无准备的情况和他的惊惶失措的情绪已经暴露出来的时候，西塞罗虽然十分尖锐地责备自己的“英雄”，却仍然站在他的一边。庞培的名字被冠以“我们的”字样，他被称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庞培”，而恺撒则不再被冠以“统帅”一类的头衔，而只是冷淡地用“他”、“那个人”之类的字样来称呼了。随着军事行动的展开，西塞罗对恺撒的描述与评价也变得越来越明确了。“国家从不曾处于如此的危险之中，无耻的公民们从不曾有过更加现成的统帅了”，随后西塞罗又指出，恺撒是在犯什么疯病了^①，而最后他竟愤怒地叫道：“堕落的强盗！这是国家的耻辱，这种耻辱看来未必是任何和平所能补偿的！”^②

这样看来，在内战期间（无论如何也在恺撒取得明显的胜利之前！），西塞罗对恺撒的态度是不会引起任何怀疑的了：恺撒是反对 *res publica*（共和）的歹徒，是一切“正直的”公民的敌人、元老院的死对头、“堕落的公民”。凡是读过西塞罗的传世著作的“非公开的”部分的人，读过他的大量信札的人，他所看到的就正是这样一个形象。

如果我们看到的是西塞罗在公开场合的发言，是他的那些在某种程度上涉及恺撒的国务活动的演说，那末我们看到的便完全是另外一个统帅和政治改革家的形象了。在《论前执政官治理下的行省》这一演说中，恺撒被称颂为一位杰出的统帅、一位有先见之明、甚至是明智的政治家。他不止

① 《致友人书》，第16卷，第11章，第3节；第12章，第2节。

② 《致阿提库斯书》，第7卷，第18章，第2节。

一次地谈到恺撒的“优良品质”和“光荣”。在高卢进行的战争被称为“最伟大的”战争。西塞罗怀着激动的情绪叫道：“难道我能对这样一个人抱有敌视的态度吗？要知道，他送来的报告、他的声名、他的使节每天都用新的部族、民族和地点的名称来使我听了欢喜！”^① 恺撒对罗马国家的特殊功勋就在于，他懂得高卢的存在这件事本身对罗马人是怎样一种潜在的威胁，因此他第一次发动了不是防御性的战争（过去一直是这样的战争），而是一次目的在于彻底征服高卢的战争。而且，由于恺撒“早就建立了相当多的、使他获得荣誉的战功，但是没有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做到应做的一切”，因此西塞罗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不应当把热望出色地执行国务活动的统帅召回，不应打乱他的几乎实现的全部在高卢作战的计划，不应阻碍这一计划的完成。”^②

《论前执政官治理下的行省》这一演说是在公元前56年发表的，这时还远在内战爆发之前，当然更是远在恺撒取得胜利之前了。但是西塞罗在恺撒已经成为全权的独裁官的时期（公元前46—公元前45年）所作的演说保存下来的却有三篇。可以想见，这几篇演说当然是充满了对恺撒的过分的颂扬的。

这些演说中的第一篇是公元前46年秋天在元老院发表的，它论述的是恺撒的仁慈行为：恺撒允许自己的死敌、公元前51年度的执政官玛尔库斯·克劳狄乌斯·玛尔凯路斯从流放地返回罗马。因此在西塞罗的这一发言中——顺便指出，西塞罗是在独裁官本人在场的情况下发表这一演说的——首先就颂扬了恺撒的仁慈，他还论证说，使人“达到神

① 《论前执政官治理下的行省》，第22章。

② 同上书，第35章。

的高度”的最高美德，并不在于对“残暴的蛮族”所取得的
⑩ 胜利，而在于对自己以及对自己对于私人仇敌感到的愤怒和
敌对情绪所取得的胜利①。

但是对恺撒的描述并不仅限于强调他的仁慈；除去这种“神一般的”品质之外，他还指出恺撒的治国才能、远大志向和他要完成的重大任务。关于这些任务以及关于西塞罗在为玛尔凯路斯辩护的演说中提出的那些改革的纲领，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②。使我们感到兴趣的演说很早就引起了研究者们的注意，而某些研究者认为，西塞罗这时诚心诚意地相信，恺撒可以成为共和国的领袖，成为“国家的第一公民”(*princeps civitatis*)——对于这样一个人物的形象，西塞罗本人在他的有关国家的著名论文中作了描述。③

为庞培派利加里乌斯辩护的演说是公元前46年在罗马广场上当着恺撒的面发表的。这是一篇“请求宽恕”的演说，因为西塞罗并不能否认自己的被辩护人由于在阿非利加站在庞培的一边作战因而是有罪的。而尽管恺撒在审讯之前就曾对自己的友人们说：“为什么不听一听很久没有听到的西塞罗的意见，更何况这一案件的结果是已确定了的：利加里乌斯是一个恶棍，我的敌人。”但西塞罗的演说对他和全体听众还是产生了如此不可磨灭的印象，结果利加里乌斯竟然得到了宽恕④并且返回了罗马。后来此人参加了谋刺恺撒的阴谋者的队伍。

① 《为玛尔凯路斯所作的辩护》，第12章。

② 参见本书原文第291—292页。

③ 爱德华·迈耶尔(E. Meyer)：《恺撒的君主制和庞培的元首制》(*Caesar-Monarchie und das Prinzipat des Pompeius*)，斯图加特与柏林版，1922年，第406—407页。

④ 普鲁塔克：《西塞罗传》，第39章。

在为利加里乌斯辩护的演说中，西塞罗再次称颂了恺撒的主要的美德——仁慈。演说中还谈到了“宽厚与睿智的光辉”。最后，西塞罗看来是第一次为甚至是恺撒在内战中的行动和目的本身进行辩护：“当你作战的时候，除了对凌辱进行反击这一意图之外，你还有什么别的意图吗？你的不可战胜的军队如果不是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和你的尊严，那又是为了什么呢？而当你力图缔结和约时，你是力图同罪犯还是同正直的公民达成协议呢？”^①

看来，就我们感到兴趣的方面来说，西塞罗在公元前45年为加拉提亚的国王戴欧塔茹斯所作的辩护（国王自己身边的人们指控国王想谋害恺撒）同上面我们刚刚谈到的那些演说没有任何区别。西塞罗不仅使戴欧塔茹斯摆脱了这一指控，而且还通过使用各种不同的机智的演绎法试图证明，戴欧塔茹斯只是由于误会才成了庞培派的。

因此西塞罗的公开的发言，也可以说他的传世作品中带有官方性质的部分，就为我们提供了恺撒的一个完全不同的形象。如果我们手里只有这一部分材料，那我们就可以说，在西塞罗的心目中，恺撒是一位杰出的统帅、一位明智的政治家和改革者，一个十分慷慨大度的人，无宁说他是迫不得已才打内战的，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对凌辱进行反击”，保卫自己的权利、自己的尊严。

但实际上西塞罗从来没有这样认为过，这样考虑过。在恺撒死后，他终于能以完全不顾情面地表示自己对恺撒的态度。因此，对于3月15日恺撒被刺的事件，他并不想掩盖自己的明显的赞同态度、甚至高兴的心情。如果说有什么使他

① 西塞罗：《为利加里乌斯辩护的演说》，第18章。

感到不安的话，那只是“不放心被打败的人们”，只是“暴君倒下去，但暴政却还存在”，或者换句话说，西塞罗不是没有根据地担心独裁制度的复活——他始终认为这个制度是残暴的。至于恺撒本人，则这时他正是被称为“暴君”或者“国王”(rex)^①了。指出如下一点是有趣的，即这样的描述已经不仅仅出现在西塞罗的书信之中，它们也出现在他的传世作品的“带有官方性质的部分”里。例如，《论义务》^②这篇论文——西塞罗的最后一部大作品——就有明确的反恺撒的倾向。

这篇论文一开头就着重指出，恺撒的例子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恩尼乌斯^③的这样的话：“在王政制度下，没有神圣的共同性，也没有忠诚可言”，因为恺撒为了自己的统治和优势地位而践踏了“一切神的和人的法律”。在论文的第二卷里，恺撒经常被称为践踏法律和自由的暴君，他的灭亡完全是罪有应得的；就某一方面来说，他甚至比苏拉还坏，因为他是出于不公正的和不能容许的原因而进行战争的（而可以看出，这同西塞罗本人不久之前的说法是完全矛盾的！）并且

12 在他取得了可恶的胜利之后，竟蹂躏了整个整个的公社^④。

西塞罗在恺撒死后对恺撒的人格的描述和评价除了本身的明确性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它们显然是回溯性的，是以某些总结性的结论为依据的，因此它们不可避免地要显露出

^① 参见《致阿提库斯书》，第14卷，第62章；第15卷，第1章；《致友人书》，第11卷，第3章，第1节；第27章，第8节；第12卷，第1章，第1节；《致布路图斯书》，第2卷，第5章，第1节等等。

^② 《论义务》(De Officiis)，此文共三卷，完成于公元前44年11月5日。

——译注

^③ 克温图斯·恩尼乌斯(Quintus Ennius)(公元前239—公元前169年)，诗人，被称为“罗马诗歌之父”，他的作品只有片断保存下来。——译注

^④ 《论义务》，第1卷，第26章，第2卷，第26—29章。